



大夏教育文存

欧元怀卷

主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常国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教育文存

欧元怀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常国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夏教育文存·欧元怀卷/杜成宪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675 - 6284 - 4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923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大夏教育文存 欧元怀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常国玲

策 划 王 焰

责任编辑 金 勇

特约审读 李 娟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2.75

字 数 35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6284 - 4/G · 10227

定 价 10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大夏教育文存》编委会、顾问名单

编委会

顾问 孙培青 陈桂生

主任 袁振国

委员 叶 澜 钟启泉 陈玉琨 丁 钢
任友群 汪海萍 范国睿 阎光才



欧元怀(1893年—1978年)

前言

一

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也成立了教育系,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之源。当时教育系的教师来自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教育系科,汇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堪为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界代表。如:国民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实施部聘教授制度,先后评聘两批,各二三十人,集中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两批部聘教授里均只有一位教育学教授,分别是孟宪承、常道直,后来都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孟宪承还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建国”、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考虑,建立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五所附设于大学,一所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即为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为廖世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奠定中国社会事业研究的基础的言心哲,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翻译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曹孚,后为支持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奉调入京;主持撰写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就是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60多年的发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著名学者当年藉以成名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于世,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著作甚至湮没不闻,以至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所知不详,尤其是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知之甚少,而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化探索的代表作。因此,重新研究、整理、出版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的教育学术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在教育系教师名册上的教授共有27位,包括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当时身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的曹孚被任命为教育系系主任,但由于工作原因晚一年到职,实际上教育系就有教授 28 位。除个人信息未详的二位外,建系教授简况见下表。

出生年代	姓名(生卒年)	建校时年岁	学历、学位
1890—1899	赵迺传(1890—1958)	61	大学肄业
	廖世承(1892—1970)	59	博士
	张耀翔(1893—1964)	58	硕士
	高君珊(1893—1964)	58	硕士
	欧元怀(1893—1978)	58	硕士
	孟宪承(1894—1967)	57	硕士
	谢循初(1895—1984)	56	学士
	黄觉民(1897—1956)	54	硕士
	萧孝嵘(1897—1963)	54	博士
	黄敬思(1897—1982)	54	博士
	常道直(1897—1992)	54	硕士
	沈百英(1897—1992)	54	五年制中师
	言心哲(1898—1984)	53	硕士
	陈科美(1898—1998)	53	硕士
	方同源(1899—1999)	52	博士
1900—1909	赵廷为(1900—2001)	51	大学预科
	左任侠(1901—1997)	50	博士
	谭书麟(1903—?)	48	博士
	萧承慎(1905—1970)	46	硕士
	胡寄南(1905—1989)	46	博士
	赵祥麟(1906—2001)	45	硕士
	沈灌群(1908—1989)	43	硕士
	朱有璇(1909—1994)	42	学士
1910—1919	曹孚(1911—1968)	40	博士
	刘佛年(1914—2001)	37	学士
	张文郁(1915—1990)	36	学士

(本表参考了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习纪事(1951—1965)》一文)

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初建、教育学科初创时的教授们,出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 15 人,20 世纪 00 年代的 8 人,10 年代的 3 人;60 岁以上 1 人,50—59 岁 16 人,40—49 岁 7 人,40 岁以下 2 人,平均年龄 50.73 岁,应属春秋旺盛之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有不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11 人,学士 4 人,大学肄业 1 人,高中 2 人。他们大体上属于两代学者,即出生在 19 世纪 90 年代、成名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代(五六十岁),出生在 20 世纪、于二三十年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三四十岁)。对于前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早已享有声誉且尚未老去;对于后一代学者而言,他们也已崭露头角且年富力强。相比较而言,前一代学者的力量又更为强大。任何一个高等院校教育系,如能拥有这样一支学术队伍都会令人感到自豪!

三

令后人感到敬佩的还在于这些前辈教授们所取得的业绩。试举其代表论之,以观全豹。

1923 年,将及而立之年的孟宪承撰文与人讨论教育哲学的取向与方法问题,提出:教育哲学研究是拿现成的哲学体系加于教育,而将教育的事实纳入哲学范畴? 还是依据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教育过程,批评现实教育进而指出其应有价值? 他认为后者才是可取的。理由是:教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用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研究导源于实际教育需要,是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而其结论也需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这样就倡导了以实际教育问题为出发点的教育哲学,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的转型,即从以学科为出发点转向以问题为出发点,转向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儿童,从哲学层面作出了说明。之后,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成为一时潮流。1933 年,孟宪承出版《教育概论》,就破除了从解释教育和教育概念出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而代之以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为起点的教育学叙述体系。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1934 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的《教育概论》纲目与孟宪承著《教育概论》目录几乎相同。而孟著自 1933 年出版至 1946 年的 13 年里共印行 50 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科书之一。可以看出孟宪承教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理论转型、教育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1921年,创始于美国、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因其注重个别需要、自主学习、调和教学矛盾、协调个体与群体等特点,而受到中国教育理论界和中小学界的欢迎,一时间,诸多中小学校纷纷试行道尔顿制,声势浩大。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是其中的典范。当时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正是廖世承。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严格按照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方法与程序要求进行,从实验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实验的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得十分规范,保证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尤其是实验设计者是将实验设计为一个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比较的对比实验,以期验证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长短优劣。在实验基础上,廖世承撰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报告依据实验年级各科实验统计数据、实验班与比较班及学生、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实施道尔顿制的优点与缺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和东南大学附中的实验及报告,不仅澄清了人们对道尔顿制传统教学制度的认识,还倡导了以科学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风气,树立了科学运用教育研究方法的楷模,尤其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了如何对待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此外,廖世承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首开心理测验,所著《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开创性。

1952年曹孚离开复旦大学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是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195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的《杜威批判引论》出版。书中,曹孚将杜威教育思想归纳为“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人云亦云之说,而是显示出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超越了众多杜威教育思想研究者。他当时就指出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缺陷,即片面强调活动中心与学生中心,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孟宪承曾称道:“曹孚是真正懂得杜威的!”后来,刘佛年在为《曹孚教育论稿》一书所做的序中也评价说:“这是我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第一次最系统、最详尽的批判。”曹孚长于理论,每每有独到之论。50年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先是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育学,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大加挞伐,少有人真正思考教育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教育学问题。曹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包括哲学、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工作经验、中国教育遗产和心理学五方面；针对当时否定教育继承性的观点，他提出继承性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既是上层建筑，也是永恒范畴；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批评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标准，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的评价原则，主张将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教育主张区别而论，主要依据教育思想来评价教育人物；他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以吸取和改造的。在当时环境下，曹孚之言可谓震聋发聩。

1979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之前，从1962年至1964年曾四度内部印刷使用，四度修改。“文革”中还被作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1961年初，刘佛年正式接受中宣部编写文科教材教育学的任务。当年即撰写出讲授提纲，翌年完成讨论稿。虽然这本教育学教材在结构上留下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痕迹，但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考。教材编写体现了对六方面关系的思考和兼顾，即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历史与理论、正面论述与批判、共性与特性。事实上这也可以说作为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教材编写之初，第二部分原拟按德育、智育、体育分章，但牵涉到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出现重复。经斟酌，决定按学校工作逻辑列章，即分为教学、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等章，由此形成了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具体工作的理论逻辑，不失为独特的理论建构。1979年教材出版至1981年的两年间，印数近50万册，就在教材使用势头正好之时，是编者主动商请出版社停止继续印行。但这本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其辍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起到了重建“新时期”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材体系的启蒙教材作用。

不只是以上几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系教授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如，常道直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探索与开拓，萧承慎对教学法和教师历史及理论的独到研究，赵廷为、沈百英对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深入探讨，沈灌群对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的重新建构，赵祥麟对当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开创性研究，等等，对各自所在的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被载入学科发展的史册。还有像欧元怀，苦心经营大夏大学二十多年，造就出一所颇有社会影响的著名私立高等学府，为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创造了重要的空间条件。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与事业，都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此次编纂《大夏教育文存》视为一次重新整理和承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契机。

我们的宗旨是:保存学粹,延续学脉,光大学术。即,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华加以保存,使这些学术成果中所体现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更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能有机会观览、了解和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激发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宗旨。

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们很希望能够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代代前辈学者的代表作逐步予以整理、刊布,然而工程浩大,可行的方案是分批进行。分批的原则是:依据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代表性、当时的影响和对后世影响的实际情况。据此,先确定了第一辑入选的 11 位学者,他们是:孟宪承、廖世承、刘佛年、曹孚、萧承慎、欧元怀、常道直、沈灌群、赵祥麟、赵廷为、沈百英。

《大夏教育文存》实际上是一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曾经在教育学科任教过和任职过的著名学者的代表作选集。所入选的著作以能够代表作者的学术造诣、能够代表著作撰写和出版(发表)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够为当下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为原则。也有一些作品,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历程留下前进的脚步。

《大夏教育文存》入选者一人一卷。所收录的,可以是作者的一部书,也可以是若干部书合为一卷,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代表性论文的选集,还包括由作者担任主编的著述,但必须是学术论著。一般不选译著。每一卷的选文,先由此卷整理者提出方案,再经与文存总主编共同研究商定选文篇目。

每一卷所入选著述,在不改变原著面貌前提下,按照现代出版要求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字词和标点符号的校订,讹误的订正,专用名称(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的校订,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核实及注明出处,等等。

每一卷由整理者撰写出编校前言,内容包括:作者生平、学术贡献、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对所作整理的说明。每一卷后附录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五

编纂《大夏教育文存》的设想是由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的范国睿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作为中国教育学科的一家代表性学府,理应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己的历史和传统整理清楚,告诉后来者,并使之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代表性著述,我们有责任将前辈的著述整理和保护下来。他报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将此项目立项为“华东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获得资助。还商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和资助,立项为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可以说,范国睿教授是《大夏教育文存》的催生人。

承蒙范国睿教授和时任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的信任,将《大夏教育文存》(第一辑)的编纂交由本人来承担,能与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上的这些响亮名字相伴随,自是莫大荣耀之事。要感谢这份信任!

为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孙培青、陈桂生两位先生能够担任文存的顾问,得到他们的支持。两位先生与入选文存的多位前辈学者曾是师生,对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师多有了解,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十分有价值的指点,如第一辑入选名单的确定就是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对两位先生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存选编的团队是由教育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硕士生所组成。各卷选编、整理工作的承担者分别是:孟宪承卷,屈博;廖世承卷,张晓阳;刘佛年卷,孙丽丽;曹孚卷,穆树航;萧承慎卷,王耀祖;欧元怀卷,蒋纯焦、常国玲;常道直卷,杨来恩;沈灌群卷,宋爽、刘秀春;赵祥麟卷,李娟;赵廷为卷,王伦信、汪海清、龚文浩;沈百英卷,郭红。感谢他们在选编和整理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研究生董洪担任项目秘书工作数年,一应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入选文存的前辈学者的家属们!当我们需要了解前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成就,希望采访家属后人,我们从未受到推阻,得到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热心帮助。家属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的访谈,还提供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对我们完成整理工作至关重要。谢谢各位令人尊敬的家属!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存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资深责任编辑金勇老师的耐心而富有智慧的工作,保证了文存的质量。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杜成宪
2017年初夏

编校前言

欧元怀(1893—1978),字愧安,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教授、总务长。1924年参与创办大夏大学,1928年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学校西迁,并于1940—1945年任贵州省教育厅长,1944年起任大夏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于1946年秋迁回上海原址。1951年华东文教委员会报请中央教育部批准,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创建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欧元怀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任副总务长、教育系教授。

→

福建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毗邻省会福州、侨乡泉州,在近代中国较早受到西方文明的浸润。1893年8月1日,欧元怀出生于此,父亲欧剑波是位穷秀才,以教塾自给。欧元怀早年随父亲受学,1904年考入当地第一所官立小学堂。学堂主持为老举人张介安,故虽具新型,仍“未脱科举时代方法”。^①后来,张介安之子张左如自日本留学归来,对课程、校务作了一番改革,“功课方面添有卫生理化博物等科,校务措施焕然一新,如有现代学校之模型”^②。这一改变令欧元怀眼前一亮,他很快适应了新的教育方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传统教育强调心性品质的养成、治学之法与处世之道,而新式学堂则偏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授,重视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学生个性的养成,这种“中西兼备”的早年求学经历对欧元怀的人生道路和办学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8年,欧元怀从小学堂毕业,此时他“四书都读完,《诗经》与《尚书》亦曾读毕,并已习算学、英文、中外史地、博物、卫生、理化修身等科”。^③1909年,欧元怀赴福州报考省立师范学校,当时的学校多通过提前考试来排挤远道而来的学生,欧元怀因错过考期不得不折返,在小学英语老师的帮助下,进入家乡一所教会中学——哲理中西学堂就读。欧元怀入学成绩优异,得全免学费的优待,又以为学校书记抄写讲义每月得二元饭食之资。他心性聪慧,肯下功夫,一年

^① 欧元怀:《我怎样求学的》,《大夏周报》24卷13期,1948年,第1页。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后跳级到三年级，“五年制的课程，我四年修完，考试成绩在该班也并不落人后”^①。

中学毕业后，欧元怀再次来到福州，入福音书院进修。学校里一位刚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想学当地方言，请欧元怀当他的“老师”，欧元怀欣然同意。两年中，二人互为师生，学习异国语言，欧元怀的英文进步很快，萌生了去美留学的念头。

1914年，欧元怀得亲戚、师友襄助，准备赴美留学，初次申请因患眼疾办理护照时未得通过，后又因鼠疫流行再次推迟。1915年终于如愿，随返乡的美籍教师郜温柔同行。真是好事多磨，初到旧金山，欧元怀便被移民局送到“天使岛”留居三天，检查身体并办理各项手续，其间遭遇种种羞辱，22岁的欧元怀深以为耻，第一次体会到国家兴盛与国民个人的密切关系，决定把美国政府对中国人的不公平待遇化作求学的动力，争取早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欧元怀先进入美国西南大学就读，主修生物，辅修教育。因英文程度不够，校方安排他随英文教师补习，欧便在这位教师家中每日服务三小时，做些刈草清扫的工作，过了一学期，英文程度已无问题。当时的西南大学仅四个中国学生，四人合租一水电设备俱无的陋室，轮流担任打扫烧水的工作，第二天要烧的柴由前一日轮值者准备，寒冬时节，早晨打来的洗脸水漂浮着冰块，“全凭个人之相当抱负与坚强之意志乃得克服此一困厄”^②。欧元怀在西南大学以三个暑期补一个学期，三年半就完成了四年的课程，读书期间还要做各种零工以赚取生活费用，“为人摘樱桃，为杂货店送货，为校中办公室发信，为农家刈麦，文物粗细，风味均尝”^③。

1918年6月，欧元怀从西南大学毕业，他已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抱定了毕生从事教育的决心。20世纪初，远在美国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因杜威、孟禄、桑代克等名师而声名鹊起，欧元怀遂决定赴哥大读书，但此时他身上只剩5美元，连东去的车资都不够。无奈之下，欧元怀只得先去做搬砖的工人，因当时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工资较高，两个星期后他便筹得旅费，动身前往芝加哥，并向哥大师范学院申请入学。东去途中，因受福音书院时一位教师所托，到俄亥俄州其亲戚家探望，二人相谈甚欢，欧便留在其汽车行中

① 欧元怀：《我怎样求学的》，《大夏周报》24卷13期，1948年，第1页。

② 同上注。

③ 欧元怀：《我怎样求学的》，《大夏周报》24卷13期，1948年，第2页。

做修车开车的工作，夏天过后积得 500 多美元，寄去哥大的申请也获得通过。

欧元怀入哥大师范学院教育行政系学习，与陈鹤琴同学。当时哥大将部分学生宿舍改为兵营，外国学生无宿舍可住，欧元怀与陈鹤琴等中国同学只得另租房屋，组织“Chinese House”，陈为主任，欧为副主任，二人因此结下深厚友谊。欧虽有暑期所余积蓄但生活仍觉困难，又过起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活，先是在幻灯影片公司画幻灯片，别人一小时画一张，他二小时画三张，工作又可带回课余去做，收入尚可。但做了不及一年，因眼疾复发，不得不放弃，1919 年转去教育电影公司做编译部副主任。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去公司做事，工资每月有 100 美元，照当地生活水平仍为拮据，因他简朴自持，“尚有余力借助他人”^①。

在哥伦比亚大学，欧元怀不仅系统学习了教育行政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学、乡村教育等方面的课程，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曾两任师范学院中国学生会会长，自学注音字母等知识，举办注音字母班，训练侨胞学习国语。1920 年华北遭受特大旱灾，欧元怀参加纽约中国学生会组织的剧团，为华北灾荒筹款进行义演：

在纽约中国学生曾组织剧团为华北灾荒筹款，曾由张彭春先生主编《木兰从军》一剧，由洪深先生导演，我在这剧中担任“和尚”角色，曾至各地公演，我并往美国中部募捐，劝募团至华盛顿时，哈定总统在白宫欢迎我们，我们也募捐了不少钱给华北灾民。^②

1920 年夏天，欧元怀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与行政学硕士学位，他并没有急于回国，而是暂时性地留在美国工作。

二

1922 年，欧元怀抵达上海，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欧元怀曾与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有过书信来往，对其毁家（变卖别墅）兴学深表敬佩，陈嘉庚亲笔回信鼓励欧元怀努力求学，学成后回桑梓服务。因此，欧元怀到上海后，谢绝了北方某师范大学的聘请，即南下厦门大学教育科任教。初到厦大，欧元怀精力充沛，满心抱负，厦大校长林文庆欣赏欧元怀的才华，对其礼遇有

^① 欧元怀：《我怎样求学的》，《大夏周报》24 卷 13 期，1948 年，第 2 页。

^② 同上注。

加,颇得重用。第一年欧元怀除担任三门课的教授外,兼做教务主任和注册主任,第二年又改做总务长。照此情形,欧元怀只要尽职尽责,颇可以在厦大平步青云。

然世事变幻莫测,1924年春,厦门大学部分学生向校方提出改革校务的要求,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带头的学生陈国柱。欧元怀等教授为学生说情,请求减免处分,未得应允。5月,校方突然提前解聘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当时欧是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王是商科主任,傅是注册主任。此举立即引起教育科、商科学生的罢课反对,随即罢课风潮波及全校,学生与校方关系不断恶化。6月1日,学校当局又公然指使人殴打集会学生,引起更大不满,400多名学生中有320多名集体离校,以示抗议。一些教授愤而辞职,欧元怀随部分师生一道离开了厦门大学。

6月13日,离校师生乘船离闽来沪,到上海后因学生人数众多,且学潮事件影响颇大,各校闻学潮而色变,一时间无处求学。离校学生公推何应炳、罗士清、施乃铸等14人为总代表,恳请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余泽兰等9位离校教授另立新校,帮助解决失学问题。诸教授勇于担当,租凭法租界贝德路(今成都南路)美仁里24号为临时筹备处,宜昌路115号为校舍。校名拟用“大夏大学”,经讨论定为“大夏大学”,既表示学校由脱离厦大而来,又寓光大华夏之意。7月9日,9位教授和14位学生代表联合发出《大夏大学临时筹备处成立通告》。创办新校,以筹措经费为最急,“欧元怀在闽筹款尤力,莆田陈树霖慨捐五千元为该大学开办费,于是筹备进行不阻”^①。8月1日,筹备处召开会议,推举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为执行干事。8月中旬,学校董事会完成组建,欧元怀为第一任校董,另有王伯群、吴稚晖、汪精卫、张君劢、叶楚伧、邵力子等人。

1924年9月20日,大夏大学在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家花园举行开学典礼,共有教员30余人,新旧学生240余人。10月22日,学校董事会正式成立,公推王伯群为首位主席董事,马君武为首位校长。1927年1月,因马君武受李宗仁之邀,回乡创办广西大学,大夏大学改为委员会制,王伯群兼任委员长。1928年3月,大夏大学根据教育部令改委员制为校长制,经校董会选举,王伯群为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当时王伯群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校务实际上一直由欧元怀负责。1930年学校迁入新址,即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东面(含丽娃河)大部分区域。

欧元怀办理大夏大学,尤为注重三件事:一是筹集经费,二是延聘名师,三

^① 《厦大校史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是关爱学生。大夏为私立，经费主要靠学费和捐款两条渠道，学费如果收得太高，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捐款成了重要的经费来源。除了鼓励校董积极捐款，欧元怀亲自出马，“终日奔走于各银行大亨之门，足将近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种种窘状，一言难尽”，他自嘲自己是“马路上的教育家，汽车上的高等乞丐”。^① 欧元怀认为要建设好私立大学基础，必须设立稳固的基金，他制定了筹集五百万元基金的计划，“我人应做大规模的基金运动，以达到五百万元为目的，使学校立于永久不拔的基础”。^② 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宏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欧元怀对于聘请教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教授在大学的地位，实比经费来得重要”，^③但大学的教授必须是学问与品格兼备，“凡欲为人师者，其平日对于学术的研究，固属重要，而高尚人格的涵濡，尤不可或缺”，^④因为教授的学识与人品，不仅关系大学的声誉，更是学生的表率，对学生的学业与品格的进步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欧元怀聘请教授时，不拘于是否有留学经历。中国现代著名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仅有中等师范学校学历，但他教学有法，被欧元怀请到大夏教育系任教。为了吸引优秀师资前来任教，并使教师能够安居乐业，专心于教学研究，欧元怀十分关心教师的生活，据一位到大夏任教的教师回忆，欧元怀等曾亲自到家中看望，“对于我们的居处是否已布置妥帖，家庭间的生活情况，均承王、欧两师殷殷问及，使我有‘如归’之感”^⑤。欧元怀还曾为教师当月下老人，大夏教师吴泽霖、陆德音“经欧师元怀极力撮合，遂成美满良缘”^⑥。正是在欧元怀的精心努力下，大夏大学名师荟萃，以教育学院为例，邵爽秋、郑通和、马宗荣、曾慎、朱经农、何炳松、李石岑、程石煃、程湘帆、程其保、艾伟、俞庆棠等知名学者都曾来校任教。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欧元怀常请一些学术名家到校做学术讲座，“欧副校长每周必请名人到校，为学生演讲一次”^⑦。陶行知、胡适、鲁迅等都曾到大夏演讲。即使在抗战时大夏内迁至环境艰难的贵阳，欧元怀也常常请过境的一些名流学者到校讲话，“是师生们十分欢迎而感兴趣

^① 欧元怀：《大夏大学十一周年纪念告同学书》，《大夏周报》11卷27、28期，1935年，第725页。

^② 欧元怀：《今后大夏进展的方针》，《大夏大学六周年纪念特刊》，1930年，第267页。

^③ 欧元怀：《论今日大学教育诸实际问题》，《教育杂志》27卷1期，1937年，第61页。

^④ 欧元怀：《师资训练的根本方针》，《教育杂志》25卷7期，1935年，第88页。

^⑤ 陈明章：《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3页。

^⑥ 陈明章：《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4页。

^⑦ 陈明章：《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77页。